

扬州学派新论

赵 航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扬州学派新论

葛洪



揚州學派新論

許紹光題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扬州学派新论

作 者:赵 航

责任编辑:沈 瑞 管世俊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金坛县第二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12

字数:170,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 册(内精装 1,000 册)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9—0325—2/I.311

定 价:3.20 元 5.50 元(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《扬州学派新论》序

徐 复

清代学术，至乾、嘉两朝而如日中天，称为极盛。清初有顾炎武、阎若璩、张尔岐、胡渭，皆为硕儒。然草创未精博，时糅杂宋明澜言。章先生撰《清儒》一文说之曰：“其成学著系统者，自乾隆朝始。一自吴，一自皖南：吴始惠栋，其学好博而尊闻；皖南始戴震，综形名，任裁断，此其所异也。”乾嘉学派原本经学派系，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，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，形成所谓“朴学”，在学术上有较大贡献。吴派主张搜集汉儒经说，加以疏通，而旁及史学和文学，以谨守汉人学说为主。皖派则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点，从训诂、音韵、名物、度数等方面阐明经典“大义”和哲理，以考据精审见长，敢于突破汉人学说，提出己见，但有时亦趋于琐细。章先生又曰：“震又教于京师，任大椿、卢文弨、孔广森皆从问业。弟子最知名者：金坛段玉裁、高邮王念孙。”任大椿、王念孙皆扬州人，任传戴氏典章制度，王传声音训诂，皆有盛名于时。既而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，与焦循友善，阮元问教于二人，遂别创扬州学派，声誉因以崛起。此后浙江诂经精舍、广东学海堂诸彦，大都不惑于陈言，以知新为主，树阮氏为标帜焉。

扬学博大精深，所涉者广，于学无所不通，略记首创者

三家于下：

凌廷堪，字仲子，安徽歙县人。客居扬州，金兆燕劝入都，游翁覃溪门，乃究心经史，冀为其乡先辈江戴之学。凡六书、九数，以及古今疆域之沿革，职官之异同，史传之舛错，外属之源流，靡不井然条贯。著有《礼经释例》、《燕乐考原》、《校礼堂文集》等。

焦循，字理堂，一字里堂，江苏甘泉人。戴震的私淑弟子。家世传《易》，积久成《易通释》一书，自谓所得悟者，一曰“旁通”，二曰“相错”，三曰“时行”。复为《图略》和《章句》，总称《雕菰楼易学三书》，共四十卷。又撰《论语通释》，即仿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而作，发明性善之旨。又其《孟子正义》一书，以东汉赵歧注为主，兼采近儒数十家之说，而以己意折衷，合孔孟相传之正指，最为详备。焦氏尤精历算之学，撰有《释弧》、《加减乘除释》、《天元一释》、《开方通释》，为当时算学名家李锐等所叹服。子廷琥，字虎玉，优贡生。善承家学，以里堂既著《群经宫室考》，因别撰《冕服考》四卷辅翼之。合而观之，于礼经制度，可得其大凡矣。于算学亦颇深造，撰《益古演段开方补》，得其父的赞许。另有《读书小记》三卷。

阮元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江苏仪征人。乾隆进士。官湖广、两广、云贵总督。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，广州创立学海堂，提倡朴学，造就多士。又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，曾主编《经籍纂诂》，校刻《十三经校勘记》，汇编《皇清经解》等，对学术研究有贡献。他研究经学，直接从周、秦古书中找经典本义，撰有《诗书古训》、《论语论仁论》、《孟子论仁论》等文，具有说服力。所撰《畴人传》、《积古

斋钟鼎彝器款识》，可供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、数学家生平和古文字学的资料。有《研经室集》六十卷。

与焦循、阮元同时的学者，有任大椿、汪中、王念孙、刘台拱、李惇、朱彬、江藩、刘文淇、黄承吉等人，皆扬学钜子，各有擅长，并世学人，无其伦匹。此为扬学全盛时期。述其梗概如下：

任大椿，字幼植，一字子田，江苏兴化人。戴震弟子。乾隆进士，所学淹通，于礼尤长名物，撰有《弁服释例》、《深衣释例》、《释缙》等书，皆博采群籍，加以综合。另有辑佚书两种：《小学钩沉》、《字林考逸》，颇便学者。

汪中，字容甫，江苏江都人。少孤贫好学，三十四岁为拔贡，已誉满天下。其解经有神识，所为《周官征文》、《左氏春秋释疑》，率依据经传，箴砭俗学。于史学尤擅长，曾博考先秦古籍，研究三代以上学制兴废。作《墨子序》，对已成绝学的墨子推崇备至，认为墨子是当时之显学，墨子为救世之仁人。又作《荀卿子通论》，肯定“荀卿之学出于孔氏，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”以孔荀并提，否定了宋儒的“道统”说。他与王念孙、刘台拱友善，他们都说：“闻容甫著作益富，此人才学识三者皆过人，在我辈中，且当首屈一指。”绳誉可谓备至。著有《述学》内外篇、《经义知新记》等。他的《释三九》和《释明堂》、皆汇萃古训，为之疏通证明，不愧通儒之学。子喜孙，能承父学。又有高邮贾田祖、兴化顾九苞及子凤毛，皆治经勤劬，有闻于世。

王念孙，字怀祖，号石樵，江苏高邮人。幼年从戴震游，遂力为稽古之学，尤精声音训诂。乾隆进士，官给事中，注释《广雅》，日以三字为率，十年成书，名曰《广雅疏

证》。其书搜罗汉魏以前古训，比合音义，详加考证，以形、音、义互相推求，所得为独多。又撰《读书杂志》，校正文字，阐明古义，每有创见。另有《古韵谱》，以“至”部当独立，分古韵为二十一部，亦有发明。子引之，字伯申，号曼卿。嘉庆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。继承其父音韵训诂之学，每多独得之见。著有《经义述闻》，对于经学上的许多问题，能以己意逆经意，一经考证，涣若冰释。又撰《经传释词》，搜集周、秦、两汉古书中虚字一百六十个加以诠释，实开后来文法之先河。焦循作《读书三十二赞》，赞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》和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有云：“高邮王氏，郑许之亚，借张揖书，示人大路，经义述闻，以子翼父。”阮元撰《王念孙墓志铭》也说：“高邮王氏一家之学，海内无匹。”其为并世学人推崇有如此者。

刘台拱，字端临，江苏宝应人。任丹徒县学训导。设教以敦品立行为先，而能以身示之。精研三礼，不为虚词穿凿。所撰《论语骈枝》、《经传小记》、《荀子补注》、《汉学拾遗》，其所立义，皆能发先儒所未发。侄宝楠，字楚桢，号念楼。曾任直隶文安、元氏、三河等县知县。专治《论语》，荟萃众说，撰《论语正义》未竟业，由其子恭冕续成。另有《释谷》、《汉石例》、《愈愚录》、《念楼集》等。

李惇，字成裕，又字孝臣，江苏高邮人。博学通敏，尤精于《诗》及《春秋》三传。与同郡王念孙、汪中、刘台拱、顾九苞、任大椿为友。力倡古学，极一时之盛。乾隆进士。主暨阳书院，励诸生以朴学。所著多散失，惟存《群经识小》八卷，精确可传。

江藩，字子屏，号郑堂，江苏甘泉人。惠栋的再传弟

子。所著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、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、将经学分为汉学、宋学两大派，实际宗汉抑宋。引起宋学派方东树的论难（见所撰《汉学商兑》）。撰有《周易述补》，沿用惠栋《周易述》体例，补成完书。另有《尔雅小笺》、《隶经文》、《乐悬考》等。

刘文淇，字孟瞻，江苏仪征人。嘉庆优贡生，候选训导。平生于《左氏传》致力特勤，辑有《左传旧注疏证》一书，取贾、服、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，草创四十年，长编虽具，未及写定。后其子毓崧、孙寿曾继业，亦仅至“襄公四年”，千秋大业，终亏一篑，学者重惜之。另有《扬州水道记》等。子毓崧，字伯山，以淹通经史有声江淮间。著有《周礼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旧疏考证等，惜多未刊。毓崧子寿曾，字恭甫，少工文章，夙承庭训，遂洞达许郑之学。著有《传雅堂集》。其在书局分校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，则有《校义》、《集评》之作。

黄承吉，字谦牧，号春谷，祖籍安徽歙县，生长于扬州，习称江都人。族祖扶孟先生撰《字诂》、《义府》各一帙，博大至精，为音韵训诂学之先导，泽被后世。承吉善承家学，聪颖敏达，终日坐一室中，罗列群籍，遍为探讨，著述甚丰。主要有《梦陔堂文集》、《字诂义府合按》等。其《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》，是继宋右文说后的又一名作，使以声为纲之说寝以大昌。

咸同以后，为扬学衰微时期。诸老先生相继谢世，无有领袖人物，遂至不振。此时成学者，有薛传均、薛寿、田宝臣、梅毓、成孺等，疏记如下：

薛传均，字子韵，江苏甘泉人。撰有《说文答问疏证》

六卷，深明通转假借之义；又尝以《文选》中多古字，为之疏通证明，成《文选古字通疏证》六卷，有较好评价。

薛寿，字介伯，江苏江都人。生平专力许书，尤究心音韵之学，如以读若例说《诗经》用韵正转。又欲分《广韵》入声缉、合、盍为一部，叶、帖以下为一部，皆未有成书。所著有《续文选古字通》、《学诂斋文集》等。

田宝臣，字少泉，江苏泰州人，研精训诂，不断断于一言半字。撰《小学骈支》，论证详备，今有《海陵丛刻》本。

梅毓，字延祖，江苏甘泉人。其父植之治《谷梁传》未竟业，延祖继之，亦甫草创长编数卷，遽卒。别有《刘更生年谱》，收《积学斋丛书》中。其《续汉学师承记》，遗稿亦散失弗传。

成孺，初名蓉镜，后更今名，字芙卿，一字心巢，江苏宝应人。诸生。为学不专一家，凡历算、方輿、典礼、声音、训诂之属，皆通习之。著有《禹贡班义述》、《心巢文录》等，所载《释饼餌》、《释粥饭》二文，考证较详。

扬州学派的殿后人为刘师培，字申叔，恭甫犹子。家传文字训诂之学，宗古文经。主张以字音推求字义，用古语明今言，用今言通古语。著有《周礼古注集疏》、《周书补正》、《尚书源流考》、《读书随笔》、《左庵集》等。近人辑为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凡七十四种。

近岁张舜微先生撰《清代扬州学记》，盛称扬州诸儒承吴、皖二派以起，始由专精汇为通学，中正无弊。其说是矣，而亦风气与地理使然。又曹聚仁先生遗著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在三联书店出版，其中扬学六谈（六篇短文），

洵属当行之语。二书均系通论，示人以学习和研究的途径。近赵航同志撰成《扬州学派新论》一帙，内容为各家专论，叙述渊源，评论得失，均甚允当；又其评介各人著书，分析至详，具见功力。其堪与张、曹二先生书鼎足无疑。君早年为根柢之学，近又从事训诂研究，虽公务倥偬，犹不废学，其有成就，非冀幸也。君居扬久，又熟悉扬事，宜更作深入之探讨，则为功于扬学大矣，亦有意乎？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于南京师范大学

引 言

六十年前，支伟成完成了他的不朽巨著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后，在其“附识”中曾郑重声明：“此书主旨，在使后生学子见夫前代大师，持躬耿介，廉洁自持，壹志专心，难而后获，则可使人奋勉向学，不为物迁；更见其考证辨析，莫不条理缜密，博引旁通，则可药近人凌乱肤浅之病。”这段话，概括清代朴学家坚毅不拔、“难而后获”的精神和“专而能精”、“博而能通”的治学方法，是恰当不过的。我们把它移用来讨论“扬州学派”，同样是非常合适的。继承是为了发展，“鉴古”是为了“治今”，我们回顾、总结历史，正是要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，发展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，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基于这样目的，我们必须而且应该对任何一种历史现象作全面、深入的研究，给予它公允而精确的评价。如果只停留在“景仰之情深，研讨之功浅”的状态之中，就很容易声气附合，信口肆言，乃至攀援依附，以张门户，这根本未达于学术之肯綮，与“扬州学派”的治学精神也是大相径庭的。

讨论问题，应以立界为先。可是，对于“扬州学派”的界定，却或则模棱两可，或则语焉不详。迄今未见到有一部著作给它下一个较为严密而准确的定义。王力先生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中说：“清代是中国语言学的隆盛时期，一般人所称的乾嘉学派，指的是段、王之学，那是十八世纪下半期到十

九世纪上半期。”又说：“段、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，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。”这是以乾嘉学派来包括、代替“扬州学派”的观点，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未免显得过于宽泛。唯一可取之处在于作者给它一个特定的历史划界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张舜徽先生在《清代扬州学记》中说：“清代扬州府治，领二州（高邮、泰州）、六县（江都、甘泉、仪征、兴化、宝应、东台），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特点，都在《叙论》中首先概括地加以说明。”基于这样认识，他又补充说：“刘师培出生的年代虽较晚，却是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。”很明显，他是按籍贯来划界的，即在某个历史时期中，凡祖籍扬州的学人，都属于“扬州学派”之列。这个观点，明确倒是明确，却脱离了“学”的界域，即缺乏对其治学规模、方法、内容和次第的严格论证，似为皮相之谈，恐不足为据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一书中认为，清代乾嘉之学，是“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”，“因为乾隆、嘉庆两朝，汉学思想正处于最高潮，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。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：一是吴派，一曰皖派。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，以信古为标帜，我们叫他做‘纯汉学’；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，以求是为标帜，我们叫他做‘考证学’。此外尚有扬州一派，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、汪容甫中，他们研究的范围，比较的广博；有浙东一派，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、章实斋学诚，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。以上所举各派，不过从个人学风上，以地域略事区分。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，许多著名学者，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。”梁氏在充分肯定“扬州学派”在乾、嘉时期的学术地位及其自身的特点的同时，向我们阐明

了这样三个观点：其一，“扬州学派”是属于汉学派两个支派即吴派、皖派之外的，亦即指出它除了具有“信古”、“求是”两个特点外；尚还具有自身的特点，其二，“扬州学派”的领袖人物是焦、汪，研究范围比较广博；其三，“学派”区分的标准，以“个人学风”和“所属地域”为参考，而各派之间，各人之间又互相渗透、补充，不能过于拘泥，为其所局囿。这些意见很有见地，给人以启迪。

然而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上述诸说虽各有短长，但都没有完整地理解“扬州学派”的内涵。为了真正弄清楚“扬州学派”的界定，我们必须追本溯源，从产生这个学派的时代特点出发，加以考察。

我们知道，在有清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，大体可以划分为前、中、后三个时期。每个时期又都存在着“汉”、“宋”两大学术营垒，亦即“空疏”和“求实”的斗争贯穿始终。只不过是此消彼长的形势而已。到了清代中叶，吴、皖两派崛起，汉学逐渐占据正统地位，经学、小学以及史学、天算学、地理学、校勘学、目录学等都取得超越前代的进步。这个时候，学者们每治一书，必旁征曲喻，言不虚发，每立一论，必“揆之本文而协，验之他卷而通”，每治一业，终身为之，铢积寸累，先难后获。固能发人之所未发，言人之所不敢言，以“朴学”相矜尚，成为一代学术的中坚。与此相反，宋明理学已由极盛而转衰，虽大势已去，仍力挽危局，竭力诋毁汉学，为宋学辩护，粉饰。桐城方东树所著《汉学商兑》一书，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方东树，字植之，安徽桐城人。生于乾隆 37 年（1772），卒于咸丰元年（1851）。所著《汉学商兑》，是极力

地宣扬、维护程朱理学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。该书成于嘉庆间，正值汉学全盛时期，他对汉、宋的兴、衰有切身感受，所以针砭能切中其病，溢美则多谬说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他所处的时代是“汉学大盛，新编林立”的时代，所面对的对手是“鸿名博学，为士林所重”的大家，而自己孤踪违众，要与汉学相抗衡，却如“河滨之人，捧土以塞孟津”，所以，我们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与胆识。在该书“凡例”中，他公开声称“此书所辨，特论其纲领宗旨，宗旨既剖，则以读群书，是非白黑一览易明”，他甚至认为，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取材于“放失之事迹”，自己的目的在于“还天下之公言”，网罗的是“放失之义理”，这是何等自诩与自信。

《汉学商兑》胪列清代汉学家之说，凡数十条，计分成“析义未精”、“浅肆矜名”、“闻于是非”三种类型，把万斯同、顾亭林、焦竑、毛奇龄、惠栋、臧玉林、戴震、钱大昕等大家几百种著作中有背于性、理之学的观点一一列出，逐一加以评驳。辩驳中偏宕放激之词虽有，切中要害处亦比比皆是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指出“其针砭汉学家处，却多切中其病，就中指斥言‘汉学’者之矫诬，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，尤为知言。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，如阮元著《性命古训》，陈澧著《汉儒通义》，谓汉儒亦言理学，其《东塾读书记》中有《朱子》一卷，谓朱子亦言考证，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。”这是符合事实的。

很清楚，在这场营垒分明的论战中，为清代学术作出巨大贡献甚至堪称乾嘉之学集大成的扬州学人，理所当然为方氏的攻击目标之一，他无论是“溯畔道罔说之源”，还是“辩

其依附经义小学”而热衷考据，被誉为汉学魁杰的戴震及其弟子、师友，应该首当其冲。比如，戴氏曰：“后世儒者废训诂而谈义理，则试诂以求义理于古经外乎？经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词也，所以成词者，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。”方氏认为，说义理存乎训诂，是对的，而训诂多有不得真者，必须赖义理以审之。而汉学诸儒的释经解字，“大率祖述汉儒之误，傅会左验，坚执穿凿，以为确不可易”，如推崇许慎，却为《说文》锢蔽所囿，“或以《说文》所无，即指为非字”，这些意见，还是公允的。汉学家中确有“尊古”、“信古”乃至“食古而不化”之蔽，尤以惠派为烈，戴氏皖学虽重小学训诂，喜博引汉人旧说，然尊古而不墨守，善疑而不妄断。对于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方氏在该书中同样是肯定的。他在书中提及的扬州学人有朱泽沄、焦循、汪中、阮元、高邮二王、江藩、刘台拱等。对他们所取态度亦各不相同。

宝应朱泽沄，一生钻研朱子之学，方东树在驳斥阮元的“朱子中年讲理，晚年讲礼”时，认为这是“诬朱子中年言理，晚年始悔而返之于礼者”，并引朱泽沄的观点来佐证：“尊德性者，莫如朱子，道问学者，亦莫如朱子。彼以尊道分涂为早晚异同之论者，岂知朱子者哉。”可见是肯定的。

甘泉江藩，为惠栋再传弟子，《汉学师承记》是其代表作，方氏力诋之，认为“江氏惠氏，乃拾汉学之渣秽者也”。焦循是江氏好友，明在“二堂”之目，焦氏曰：“宋儒言性言理，如风如影”，方东树说他是连朱子书都未看懂，却凭“耳食浮游以诬之耳。”可见他是攻击的对象。

江都汪中，学识淹贯且能为文，这在当时诸儒中是独特

一帜的。特别是他的文风丽雅，为当时讲求“义法”的古文家所不容。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大胆批判，更为方氏之辈所忌恨，所以在《汉学商兑》中对他的驳难尤多。

扬州学人中受到特别推崇的是高邮二王。该书卷中之下引宋鉴《说文解字疏序》“经学不明，小学不讲也。小学不讲，则形声莫辨，训诂无据。《说文》者，小学之祖也”，方氏指出其谬凡十五种之多，惟独赞扬、佩服“二王”，认为近人说经“无过高邮王氏《经义述闻》，实足令郑、朱俛首。自汉唐以来，未有其比也。然王氏所以援据众说得真，得正，确不可易者，不专恃《说文》一书也。”

很清楚，方东树著书，旨在维护理学尊严，为宋学辩诬，就宋学本身来说，亦非完全不重实据，一味空谈。方氏诋毁者，仅为昧本而逐末。所以，他一方面认为，有清一代自顾亭林“激于时以矫敝”始，继则有阎、惠“堕本勤末”，乃至戴氏“日益寝炽”，“欲移程朱而代其统”，其后则有吴中、徽、歙、金坛、扬州数十家“益相煽和”而蔚为风气，“遍蒸海内”，这是不能不加驳辩，以维护“正道”的。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标汉学旗帜的诸儒，在天文、术算、训诂、小学、考证、舆地、名物、制度等领域的考据之功亦不能泯灭。肯定其“诚有足补前贤，裨后学者”的功绩。以这样的观点来回顾方东树对扬州学人所持的或贬、或褒、或贬中有褒，或褒中有贬的不同态度，就毫不足怪了。

在历史上，首先提出“扬州学派”这个名称的是方东树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因为他生活在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目睹乾嘉学术之盛，对活跃在这个时期的扬州学人及其著述，有比较透彻的了解。与此后诸贤论述相比，应该更能切